

试论遣使会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in China

耿 昇 中国社会科学院

Geng S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is one of five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that came into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ounded in Paris in 1625, the order devoted itself to reaching the poor who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n the urban ghettos. Its missionaries arrived in China in large numbers in 1773. Between 1697 and 1935, they counted 946 members, including Chinese priests, and inherited the properties left by the Jesuits after they were disbanded.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missionary history: they contributed to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the growth of Sinology.

141

一、遣使会士入华的背景、过程 及其在华的大致活动

遣使会(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是入华的天主教五大修会

和传教会(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外方传教会和遣使会)之一。该会于1625年在巴黎成立,其宗旨是向乡间贫苦民众们派遣布道使者、在贫穷和偏僻地区创建修院以培养的青年神职人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故而被称为“遣使会”;由于该修会的第一座会所创建于巴黎的圣—辣匝禄(Saint—Lazare),所以也被称为“辣匝禄会”(辣匝禄会士,Lazariste);由于该修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cent de Paul,1581—1660),故而也被称为“味增爵会”(Ordre de Saint-Vincent de Paul)。该修会于1632年由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1623—1644年任教皇)批准,正式跃居天主教的重要修会之列。它主要在巴黎领有法国遣使会会所,于1642年才在罗马设立永久会所。该会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并不太活跃,其活动区域有限,其布道对象也仅限于乡下贫苦民众和病人等。

142

西方基督宗教自16世纪第3次传入中国以来^①,占统治地位的应为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由利玛窦首倡的“中国文化适应”政策,虽然侥幸取得一时的成功,却埋下了“历史的祸根”,最终导致爆发了影响中西文化交流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礼仪之争”。由于天主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门户之争以及欧洲列强国家利益间的冲突,他们对入华耶稣会士们发动了向教廷“告黑状”的大战。其中最积极者便是入华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和遣使会的会士们,其目的就是在于取代耶稣会士们在华的地位与利益。教皇严禁基督徒们实施中国儒家礼仪,反遭康熙于1706年将传教士们驱逐到中国内地之外的报复。教皇于1715年颁布“自即日起”通谕,正式禁绝中国礼仪,于1773年又下令解散耶稣会。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国王于1783年要求教廷传信部准许由法国遣使会

^① 基督宗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唐代(景教),第二次是在元代(方济各会),第三次是在明末(以耶稣会为主)。

士们取代耶稣会士去主持法国北京传教区。遣使会士们便从教廷下令解散耶稣会的 1773 年起大举进入中国,奉命接管耶稣会在华传教区及其财产(教堂、设施、墓地),特别是接收了天主教在华的最大中西文文献中心北堂图书馆。遣使会士们于此前也有进入中国者,但也由此才在中国大幅度地发展起来了。

据入华遣使会士助理主教方立中(J. van Den Brandt, 1903—1908 年在华)的《入华遣使会士列传》(1936 年北平版)^①统计,在 1697—1935 年间,在华遣使会会士共有 946 人(其中有些是由他们培养的华人司铎)。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来自法国,也有少数来自荷兰、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的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是北京、直隶、浙江、江西、上海、福建、内蒙古、湖广、广东、江苏、贵州、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澳门和香港等地。虽然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区域非常广泛,但在京、津、冀、沪和宁波地区的力量最强,活动最频繁,成绩最显著。

入华遣使会士们在华的墓地很多。在北京主要栅栏墓地(共安葬 64 人),正福寺安葬着近 30 人、在河北正定府的柏棠墓地安葬着近 50 人。此外还有宁波的大方井与江北墓地,四川的凤凰山和武昌红山墓地等。

在北京三个欧洲国家(葡、意、法)都各自拥有入华天主教传教士们的墓园。葡萄牙传教士们的墓园,就是著名栅栏墓地。它是明朝政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1)赐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héo Ricci, 1552—1610)神父的。在汤若望(Adam Schall, 1591—1666)神父逝世后,它被扩展成一片占地 72 亩的墓园,后来被统称为“葡萄牙墓园”。葡萄牙入华的遣使会士们便被安葬在那里。该

^① J. van Den Brandt, *Les Lazaristes en Chine, 1697 - 1935, Notes Biographiques*, Pei-P'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1936.

墓园于1900年被义和团拆毁,修复后便被用于安葬入华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修院学员和修士们了。

“意大利墓园”与“葡萄牙墓园”只有一街之隔。它是陪同铎罗主教访华的意大利医生索格蒂(Sogotti)逝世后,由清政府赏赐的。其初期的占地面积不会超过一亩地。那里安葬着来自教廷传信部的天主教传教士们,意大利入华遣使会士德里格等人也被安葬在那里。从1900年起,它又成了专门安葬天主教女信徒们的墓园。

法国早期入华的耶稣会士们没有单独的墓园,只好“寄葬”于“葡萄牙墓园”。最后,他们于距京师两法里(lieue,每法里约合4公里)的正福寺附近获得了一片辽阔的地盘,被称为“法国墓园”。该墓园埋葬的第一位法国传教士是入华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其余者是于1735年被从“葡萄牙墓园”迁葬过去的。直到1900年为止,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们都被安葬在正福寺。它于1900年也遭义和团捣毁,被修复后,由于该墓地距城内太远,最终被放弃了,法国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都安葬于栅栏墓地。

自从耶稣会被解散之后,法国在华传教区的前途便成了一种疑问。当时在清朝宫廷中还有少数具有专长技艺和知识的原耶稣会士在活动,并对基督徒们行使圣职。法国路易十六国王曾任命尚留华的原耶稣会士晁俊秀(Francois Bourgeois,1723—1792)神父出任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但他却无法归化新信徒。非常关注该问题的法国政府便就此而着手与教廷谈判。在北京入华原耶稣会士残留人员,也不停地催促法国政府,请求迅速派遣能继承他们事业和财产的传教士赴北京。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法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建立起的这个桥头堡,不会放弃他们的贸易、外交、政治和宗教利益。法国政府先

后制订的多项计划,均遭搁浅。前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司库嘉类斯(Du Gad, 1707—1786)曾提议建造一座修院,来继承原耶稣会士们事业的计划,遭到了摒弃。让晁俊秀神父在北京建立一个宗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的计划,也最终化为泡影。当时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将北京传教转交给天主教的另一个修会或传教会来继承,由此而使之继续存在下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国在中国的利益。

法国海军部于 1782 年呈奏国王的《有关神职人员的报告》指出,此时在法国存在着两个学术水平较高的天主教修会的会士,即本笃会会士(Bénédictins)和奥拉托利会会士(Oratoriens),但该项报告将他们统统排除在外了。本笃会会士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工作具有高度专门性,注重于招收低级修士和贫苦民众,主张终生从事劳役,因而使他们很难适应于传教区的圣职,也不可能赢得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的中国人的欢心。奥拉托利会会士过分受曾与耶稣会士激烈冲突的冉森派信徒们的操纵,不但不利于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们在中国和谐地工作与生活,反而会毁掉耶稣会士们历尽艰难在华为天主教确立的影响。

嘉类斯于 1776 年又致信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Bertin),请求他向海军部长为北京传教区推荐巴黎外方传教会。这项建议于 1776 年由法国国王提出并由教廷批准。但外方传教会的负责人认为这项任命无法接受,其原因之一是“外方传教会不是学术团体”,而且该修会经常拒绝接受任何其长上不是选自本修会司铎的传教使命,况且北京的主教中从来也未曾有过外方传教会的会士。^① 实际上外方传教会深知自己难以取得入华耶稣会士们的那

^① 安多(A. Thomas),《北京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1925 年巴黎版(非卖品),第 2 卷,第 10 页。

种辉煌成就,不愿意使自己的在华活动拥有“官方”身份。

因此,海军部在致法国国王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兰西王国的所有知名教团中,唯有遣使会才堪任接管耶稣会北京教区,成为法国“官方代表”的入华修会。虽然遣使会不是一个学术团体,但这个人数众多的修会中不乏能胜任其职务的人。法国国王于是便要求教廷颁布教谕,决定以法国遣使会士取代已被撤销的耶稣会的会士们。此后不久,法国海军部办公厅主任德韦夫尔(de Vaivre)便受法国国王差遣,去拜访遣使会的总会长雅吉埃(Jacquier)。总会长开始推辞,声称他无法为一项如此重要的事业提供所必需的人员。其推辞的真正原因却是,遣使会总会长也不想派人到耶稣会士们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地方行使圣命,他自信自己难以达到昔日耶稣会士们的那种辉煌。总会长甚至一连两次婉拒了国王的要求。国王最后答应总会长,将撤并该修会在法国国内的某些机构,以使他拥有充足的德才兼备的司铎派往中国,总会长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钦命。

法国海军大臣责令德韦夫尔主任处理这些棘手之事,而且该大臣有时也亲自出面决策。他于1782年11月7日至雅吉埃总会长的信中,要求总会长审时度势地运用一切手段,以保存和发展从宗教与政治角度来看,对于法国都十分重要的北京传教区。遣使会总会长“被迫”接受国王的敕令之后,立即着手运筹遣使会士入华诸项事宜。

遣使会总会长一旦受命,德韦夫尔便立即与教廷传信部联系,以谋求教廷批准法国国王的钦定。教廷传信部最终于1783年12月7日发布谕旨,同意路易十六国王以遣使会取代已被取缔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1784年1月25日,法国国王便颁布诏书,正式命令遣使会会士们进入中国,以接管已被撤销的耶稣会士们在华

的任务和财产。^①由此可见，法国中国遣使会传教区具有“官方代表”的身份。这一点与由“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具有某种相似性。

二、法国与葡萄牙两国政府 入华遣使会问题上的竞争

最早入华的遣使会士中的“三大台柱子”是意大利人毕天祥(L. A. Appiani, 1663—1732)、德国人穆天尺(J. Mullener, 1673—1742)和意大利人德里格(P. - P. T. Pedrini, 1671—1746)。毕天祥曾先后希望在澳门、广州和北京建立遣使会的修院与慈善机构，也曾希望赴四川去实现其夙愿，成效均不显著。他曾积极配合和协助教皇大使铎罗(de Tournon, 1668—1701)出使中国的活动，筹划解决“中国礼仪之争”的陈年积案。穆天尺是教廷命令的坚定执行者和耶稣会士策略的坚定反对者，也是最早培养出3名华人司铎的传教士。音乐家德里格与画家马国贤(M. Ripa, 1682—1745)和数学家、地图家山遥瞻(G. Fabre-Bonjour, 1710年入华)关系密切，他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与清朝宫廷建立了联系。

本来，在争夺北京传教区的欧洲国家中，除了葡萄牙和法国之外，意大利也是颇具实力的。但意大利传教区在这场角逐中，最终还是退出了舞台，其主要原因是最早他们没有建立培育华人司铎的修院。

清朝朝廷对于北京传教士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了，此后于清宫中仅有钦天监的3名欧洲成员——3名遣使会士：葡萄牙

^① 安多(A. Thomas),《北京传教史》(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1925年巴黎版(非卖品),第2卷,第12-13页。

人李拱辰、福文高和高守谦,还有一名法国翻译南弥德。其他任何希望居住在中国的人,都必须放弃布道。1812年8月8日,中国的总督和官吏们将所有在北京的传教士都召至葡萄牙神父们的一座住院中,并向他们宣布说,皇帝不想驱逐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禁止他们传教;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欲离华返欧,那他们完全有权自由选择。此时,有4名意大利传教士和葡萄牙的毕学源主教都表示了回国的愿望。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毕学源主教最终愿意留下。由于4名意大利传教士未任公职,故没有必要留在中国了。由于意大利的传教士们既未在原住民中培养司铎,也未曾培养修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只好变卖自己的财产,携款而去。当时没有任何人敢购买他们的住院,清朝皇帝只好为此而付资。4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清朝政府出资被解往广州,令他们乘坐所遇到的第一艘开赴欧洲的船舶。事实上,这4名意大利传教士中有一名到了马尼拉,另一位留在了澳门圣若瑟修院,两名前往槟榔屿修院。

从此之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争夺,就主要是在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之间展开了。当时在北京只有7名传教士了,4名属于葡萄牙传教区,3名属于法国传教区。当时(1882)被认为是北京四大教堂中最漂亮和最富裕者东堂(圣若瑟堂)的藏经处失火,清朝宫廷又明令禁止重建。这样一来,葡萄牙传教区在这场竞争中便逐渐处于劣势了。^①

早期入华遣使会士们,依惯例主要是经过澳门入华,或者是从内地派遣修士到澳门学院学习和晋铎。在1851年之前,于在华的152名遣使会士司铎中,便有83人是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或者是由中国内地遣使会士们派遣到澳门的。可见当时葡萄牙政府的保

^① 遣使会士于纯璧(Alphonse Hubrecht C. M.),《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La Mission de Péking et Les Lazaristes),第174-176页。

教权势力还相当强大，各国的屈从程度还相对较普遍。^①

在 1784—1832 年间，葡萄牙籍入华遣使会士计有 21 人，分布在中国澳门、北京、南京和江南等地。他们分别于 1784、1791、1800、1802、1803、1804、1813、1825 和 1832 年等数批莅华。其中不乏重要人士，如南京主教达希尔瓦(E. G. da Sylva, 1763—1790)，1789 年被葡萄牙政府任命为南京主教，但在未到任之前便逝世于果阿。南京主教毕学源(C. Pereira, 1763—1838)于 1804 年被任命为南京主教，1827 年被任命为北京教区的管理人，自 1838 年起居住南堂，曾出任清朝最后一位钦天监正。包主教(Pereira de Borja, 1777—1845)于 1841 年被葡萄牙王廷任命为澳门主教。苏萨(Jochim de Souza, 1774—1818)于 1804 年被任命为北京主教的助理主教，但因爆发教案而阻止了他进京赴任。此外还有李拱辰(Joseph Ribeiro, 1767—1826)，1791 年入华，1803 年任东堂长上，于 1818 年以宗座代牧的身份主持北京教区的教务。高守谦(V. Monteiro da Serra, 1852 年逝世于北京)于 1803 年到达澳门，于 1804 年到达北京，长期居住北堂，以保护原法国教区的资产。他曾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北京的主教，而教廷却拒绝批准。赵神父(J. de Franca Castro E Moura, 1804—1868)于 1825 年进入中国澳门，次年又被任命为南京代理主教。后于 1833 年被任命为北京代理主教。他于 1841 年被葡萄牙宫廷任命为北京主教，但教廷希望撤销该主教位，以彻底结束葡萄牙的保教权。赵神父拒绝了这项任命，教廷也剥夺了他对北京教务的管辖权。他于 1847 年离开北京教区，从澳门撤退出去了，从此将北京传教区留给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

^①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

(Joseph-Martial Mouly, 1807—1868) 主教管辖了。^①

正当法国国王寻求以遣使会士来取代已被解散的耶稣会的会士,以图振兴法国在华传教区时,葡萄牙女王也于 1781 年呼吁葡萄牙遣使会士们去主持果阿修院。葡萄牙于 1782 年任命的北京主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de Gouvea),在前往广州(他于 1785 年入华)的途中,于 1784 年路经果阿,曾非常得法地管理过该修院。他要求葡萄牙女王在澳门也开办一座类似的学院,并从果阿的遣使会士中选择能胜任者来主持该学院,以便培养原住民中的神职人员。1784 年,葡萄牙遣使会士科雷亚·瓦伦特(Correa Valente, 1735—1804)和意大利遣使会士维拉(J. A. Villa, 1752—1803)到达澳门,汤士选立即将他们安置在过去由耶稣会士们执掌的圣一若瑟学院中。该学院在近半个世纪期间,为广东、广西和北京教区培养了许多华人司铎。葡萄牙遣使会士们便以圣若瑟修院—学院为基地,最终谋求主宰中国传教区。葡萄牙遣使会士们于 1801 年到达北京,并且占据了北京的圣若瑟堂(东堂),后于 1812 年又强行进入南堂(圣母无原罪堂),从而获得了在京师的立足之地。这也成了他们争取在华传教区的资本,并且千方百计地为法国遣使会士们进入中国设置障碍。法国入华传教士们也由此而逐渐地设法绕开澳门,而分别从广州、上海和宁波直接入华。这样便最终形成了欧洲两大强国遣使会士在华的对峙与争夺的局面。

当法国遣使会士李士奈(J. F. Richenet, 1759—1836)和马神父(L. M. Dumazel, 1785—1818)在澳门等待接受进入中国内地的皇家之“票”时,广州商人和葡萄牙的经纪人最终达成共识,联手为他们设置障碍。当时要赴北京的任何外国传教士,都必须由设在广州

^① 遣使会士于纯璧(Alphonse Hubrecht C. M.),《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La Mission de Péking et Les Lazaristes),北京遣使会印书局,1939,第 282—285 页。

的欧洲夷馆负责人(领事或大班),向中国大商行推荐。广州约有10余家这样的中国商行,享有某种与欧洲人打交道的垄断权。由他们向官府的上表,要层层上报到总督府,最后呈达朝廷。这些手续需要漫长的时间。除了广州商人的种种刁难之外,受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政府,不但会拒绝对不承认葡萄牙保教权国家的传教士们作鼎力推荐,往往还采取遏制态度。

在葡萄牙政府和教廷驻里斯本大使的干预下,终致葡萄牙女王于1799年1月16日颁布诏令,禁止澳门总督保护法国传教士,澳门“议事会”也拒不向广州总督推荐法国传教士。所以,当葡萄牙遣使会士福文高(D. J. Ferreira)和李拱辰于1801年、毕学源和高守谦于1804年顺利进入北京并占据圣若瑟堂时,李士奈和马神父仍在澳门空耗时日地等待,最终遭到了拒绝,害得他们只好绕道而行。

其实,法国与葡萄牙两国的人华遣使会士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1803年。在澳门圣若瑟堂的葡萄牙遣使会士科雷亚(Manoel Correa Valente, 1735—1804)长上为了中国事务而返回葡萄牙时,他受其法国遣使会士们的委托,曾前去向葡萄牙政府说情,希望政府能将赐予葡萄牙遣使会士们的恩泽,也扩大到法国遣使会士们身上,至少不要刁难他们,不要对他们进入中国的门户设置障碍。科雷亚运用了其全部威望进行游说,设法任命他的两名葡萄牙遣使会士教友分别出任北京和南京的主教。自希尔瓦主教逝世后,南京主教位一直空缺,由北京主教葡萄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代管。葡萄牙国王考虑到汤士选主教年事已高,于是便撤销了他对南京传教区的管理权,并将该教区委托给了葡萄牙遣使会士毕学源。科雷亚同时还向教廷建议,任命葡萄牙遣使会士苏萨(Joachim de Souza Saraiva, 1774—1818)出任北京主教的助理主教。

教廷批准了这两项任命,由此可见葡萄牙为维护自己在远东的权利,仍在作竭力挣扎,同时也不想与法国遣使会士们彻底决裂。

科雷亚所获成果不大,但他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却死于海上的一场海难事故中。苏萨被汤士选祝圣后,一直在澳门等待寻求进入北京的机会,因为中国朝廷当时严禁任何欧洲人进入中国,无论他们是否为皇帝服务都一样。由于清朝政府同时又拒绝任何欧洲传教士离开北京,故毕学源也无法赴南京就任主教。葡萄牙政府的如意算盘并未完全实现。这其中也有法国传教士们从中作梗的原因。

法国遣使会传教区长上一旦接受了接管法国北京传教区的任务之后,便将自己准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名单报告了海军部大臣。其中最著名者有3人,是重点推荐人士。他们经国王批准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钦点”的人华遣使会士。

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1754—1801)当时已经是遣使会总会的神学教授了,年长33岁。他于1783年12月17日被教廷传信部任命为法国在华传教区的长上,1784年到达广州,1785年4月29日到达北京,1785年5月正式就任法国在华传教区长上,并当选为清朝钦天监的成员,逝世后安葬于正福寺。罗广祥在到达广州后,在1784年11月2日致其家庭的书简中写道:“……我穿着一套新衣服,三层丝袍套着穿,非常肥大;头戴一顶带有红丝缨的圆帽,头颅之后垂着一根长长的尾巴;脚蹬靴子、手执一把扇子。当你们看到这一切时,一定会忍俊不禁,而第一个发笑的正是我本人。”^①当他到达北京时,受到了大清宫中的4名原法国耶稣会士们的接待,而且尚能与他们友好相处。他们认为清朝皇帝对于皇

^① 《遣使会回忆录》(Mémoires)第2卷,第75页。

城中的欧洲传教士人数的增加一定感到高兴，而对于分散在大清帝国各省中的传教士们却怀有戒心，甚至还实施打压。^①

罗广祥到达北京后，要办的第一件事便是制订一项《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以调解遣使会与原耶稣会及其他修会传教士们之间的关系，包括瓜分耶稣会遗产等敏感问题，特别是每年为文学工作的拨款、北京住院与地产的收入问题。此外，由于意大利传教区也正在通过教廷而企图夺取法国北京耶稣会的遗产，使形势更加复杂化了。但经过罗广祥的斡旋，再由法国国王与中国皇帝调解，法国遣使会士最终成为耶稣会北京传教区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同时也为尚残存于宫中的耶稣会士们留下了必需的生活手段。

罗广祥以其才能和信心，除了成功地调解各方面的关系之外，还与法国政府海军部维持着一种事务性的通讯关系。在 1785—1787 年间，他每年都向海军部寄去年度报告，其中有些可能被清朝政府的新闻审查机构截留在广州了。这些报告也形成了研究遣使会士们在北京的最初工作和探讨中国国情(旱涝灾害、饥荒、北固使节、俄罗斯商队等)的宝贵资料。

罗广祥出任法国传教区新长上之后，对每个原耶稣会士都发 400 两白银的年金。这就赢得了各修会传教士们对他的好感。他还要在住院中为每名耶稣会士单独留一片空间，以供他们自由地居住和生活。耶稣会士们死去后，必须将他们的一切都留给遣使会士传教士。罗广祥对待世俗问题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由遣使会士们所遵循。

尽管罗广祥入华时年龄已不小(30 岁)，但他很快就克服了学

^① 《遣使会回忆录》(Mémoires)第 2 卷，第 76 页。

习汉语的困难。他于1785年10月30日致其姐姐的书简中指出：“中国的语言非常奇特，与欧洲诸语言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却轻而易举地学会了它，这使所有人，首先是使我自己感到吃惊。我现在可以用汉语作祈祷了，并且为圣体瞻礼而写了一部教理问答书。”

他与清朝钦天监的官吏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继承葡萄牙耶稣会士高慎思(José d'Espinha, 1722—1788)而出任钦天监正。但他在受命担任这项正式职务之前，还曾代替已经年迈的法人华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为清廷担任与外国列强人士，特别是与俄罗斯人交涉时的翻译。

罗广祥还学会了清王朝的官方语言满语，甚至还编写了一部满语语法书，后来寄给了法国海军部大臣和法国驻广州的代表、汉学家德经(de Guignes, 1787)。他还编写了一部共分两册的鞑靼语—满族语词典，第一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英国人掠去并收藏在英伦皇家图书馆，第二册辗转到巴黎后又交给了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

罗广祥为了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曾设想在广州设立一位司库，负责法国传教区与中国当局的交涉，从而可以避开澳门葡萄牙当局的干预了。他本来希望任命原法国人华耶稣会士梁栋材(J. B. Joseph Grammont, 1736—1812)出任此职，并设法游说中国皇帝接受。但中国商会却想方设法地让人把该神父召回了北京。罗广祥又利用遣使会士韩纳庆(Robert Hanna, 1762—1797)在澳门停留的机会，委托他负责司库部。罗广祥逝世之前不久，又有一名意大利遣使会士维拉(Jean-Auguste Villa, 1752—1803)任法国传教区的正式代表，负责直接推荐准备派往北京传教区的法国传教士。皇帝的“票”终于被颁发给了广州总督，但此人因当时正指挥平叛部队作战而不在城内。其衙门的人却将该“票”又转交给澳门“议

事会”了。维拉又从澳门赶到广州，以推荐李士奈和马神父这两位传教士入华，但葡萄牙人却始终都明确地反对这类举措。最后还是正在广州居住的遣使会士明坚(P. V. Marie Minguet, 1764—1841)向广州总督推荐了那两名法国遣使会士。这两位法国遣使会士被派往湖广省。由于无法在澳门得到许可，他们只好绕道跋涉交趾支那、东京湾和四川才到任。^①

罗广祥由于中风，于1801年11月16日逝世于北京的北堂。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法国传教区无可挽回的损失。吉德明曾经说过，“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遗憾，甚至也包括异教徒在内。”罗广祥几乎具有了一位传教士和一名传教区长上应具备的全部品德与学识。南弥德认为，罗广祥似乎能够适应一切：孤独、社交、布道、经商等，对一都得心应手，而且还熟悉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他本人不是文学家，却对文学感兴趣并以拉丁文和法文写作。他可以熟悉地讲汉语，证明他曾有过许多用汉语交流的实践。尽管他很少学习鞑靼语，却能熟练地以此来表述。法国驻广州的代理人庇隆(Piron)也曾认为，罗广祥拥有大才，而且性格温和，赢得了多方位的信任。^②

法国“钦点”的第2位入华遣使会士是吉德明(Jean-Joseph Ghislain, 1751—1812)。他于1785年4月29日到达北京，负责培养遣使会北京修院的学生。罗广祥逝世后，他出任法国中国传教区的长上。他于1812年逝世后，被安葬在正福寺。吉德明基本上是罗广祥的同乡，于1771年进入遣使会修院。他学习了数学之后，又学习了物理学和化学，还精通火泵、机械、电力和电机技术，善于制造气球。但他到达中国之后，却专心于教务和培养华人原住民

^① 安多，《北京传教史》下卷，第58—60页。

^② 同上，第76页。

中的基督徒了。他在北京为中国青年创办的修院中,便有 15 名中国学生。^①

吉德明本来就是一位与罗广祥的职业相去甚殊的人物。他全身心地投身于宗教事业,而将与外部联系的烦琐事务,都转嫁给了罗广祥。他与中国官吏们打交道时,也只是获得过一种好奇性的成功,因为他只接受过低水平的初等教育。当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出使中国以缔结中英之间的一项条约时,吉德明的机械知识大大地帮助他们。吉德明在巴茂正修士的帮助下,装配了英使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自动机器,因为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内务府造办处。本来英使来华时,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找不到翻译,在英国时他们曾向巴黎的遣使会士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求过援,均无济于事。他们从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找到的两名毫无经验的青年汉语翻译,却无法挽救这次出使的失败。因为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失败,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中英双方在礼仪方面的互相误解,也是铸成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尽管英使指责入华的法国传教士们,而这批传教士实际上却帮了他们许多忙。这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既有一致的要素,也有互相冲突之处。

法国遣使会士南弥德曾取代原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Antoine Poirot, 1735—1813),于清宫中为西洋人充当鞑靼语翻译,特别是当清廷向圣彼得堡遣使时或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时更为如此。

罗广祥逝世后,吉德明同时兼任其新职务及神学教育这两项工作,于是便请求由葡萄牙控制的东堂的司铎们帮助他授中文哲学课。葡萄牙传教士菲勒蒂(Ferreti)接受了这项任务,并且还完成

^①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第 6 页;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 75 页。

得很好。这也说明法国与葡萄牙两国遣使会士之间有竞争,但也能合作。

吉德明本来希望继罗广祥逝世后出任清朝钦天监监正,从而促使澳门当局对法国遣使会士们更友好一些。但却由葡萄牙籍的方济各会士汤士选主教继任了这项职务,从而使他原来担任的监副的职位空缺了,汤士选于是便指定由南弥德来选择。为了不激起葡萄牙传教士们的敌意,南弥德仍然选择葡萄牙遣使会士福文高,尽管此人只能很蹩脚地讲几句汉语。这些善意行为终究导致东堂的传教士们致信澳门和里斯本,谋求解除其同胞们对于法国传教士们的戒备心态。

罗广祥逝世后,吉德明继任其职务。吉德明在清宫中既表现得拥有才能,也显得很虔诚。从其气质来看,他更喜欢内向性事务,而不是对外交往。他与清朝皇帝和权贵们的关系,被严格地限制在名义范围内。他很愿意骑驴或步行前往正福寺墓地。他感到最大的烦恼还是老问题。首先是葡萄牙传教士对法国传教区的封锁,因为葡方阻止法国传教士们进入北京;其次是北堂的处境甚难,因为其人员变得势单力薄了。在1801年时,北堂的司铎只减少到5名了,即吉德明、南弥德和3名华人司铎。南弥德的旅伴韩纳庆(Robert Hanna, 1762—1797),因劳累过度而患胸腔病,而先于罗广祥3年逝世,本来罗广祥曾打算让此人接替他在清宫中的工作。当时的北京主教方济各会士汤士选很快就承认了吉德明的北堂长上的资格。

吉德明很希望法国给他派遣两名具有专业知识的传教士——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因为当时在清宫中的优秀画家耶稣会士潘廷璋(Giuseppe Panzi, 1738—?)已经年逾花甲,尽管他经常在宫中,却也不能过分劳累了。因此,过去人才济济的法国北京传教

区,现在甚至无法为清朝皇宫提供一个学艺双精的会士了。

在敌视洋教的嘉庆皇帝执政期间,爆发了 1805 年的教案。这次教案的缘起,是由于受澳门葡萄牙遣使会士们派遣的一位信使,要将任命毕学源为南京主教的教皇谕旨送达北京。他在返回途中于江西被清朝官吏抓获。恰巧这名信使还携带着不同传教士们要寄往欧洲的书简。其中包括意大利奥古斯定会士、由教廷传信部派遣的传教士和清朝钦天监成员阿德奥达特(Adéodate)神父有关北京和山东传区划界问题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幅汉文地图。这引起了当地中国官吏们的警觉,于是便上报皇帝。皇帝由此而认为,其同谋者正是传教士和基督徒们。由此而爆发了一场大教案,大批在京传教士遭逐。^①

在这场教案的高潮中,汤士选于 1808 年死于南堂。东堂或圣若瑟堂于 1812 年被拆毁,东堂的葡萄牙遣使会士们,如毕学源、李拱辰和苏萨等都被迫迁至南堂逃难。与此同时,法国遣使会士吉德明和南弥德也只好遣散其修院的部分学生。在本来就积累如山的困难中,又雪上加霜地出现了财政困难,因为当时必须修缮因暴雨而几乎完全坍塌的建筑物。1811 年,御史甘家斌又一次挑起教案。传教士们为了逃避清朝官吏们的搜捕,几乎耗尽了其全部积蓄。^② 1912 年,吉德明已心力交瘁,预感到了自己将不久人世了。他将其职务交给了南弥德,令人把自己抬到了法国传教士们的正福寺墓地,以便就地死亡,并坚持他一生恪守的贫穷和艰朴之信条。事实上,过去有的传教士们的葬礼很豪华和很昂贵。罗广祥为汪达洪举行的葬礼共耗费 4000 法郎。汤士选曾对传教士们的殡葬礼仪作过大幅度简化。

① 《仁宗实录》卷 142,《清代外交史料》卷 1,《北京传教史》卷下,第 82-97 页。

② 《仁宗实录》卷 243、246,《北京传教史》卷下,第 95-97 页。

吉德明于1812年8月12日逝世于正福寺墓地,由南弥德及其初修士们陪同他度过了弥留时光。他享年62岁,其中28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不但使北京的法国传教机构变成了一个学术与艺术馆,而且还使清朝京师及各省中的基督宗教得以发展,亲自巡视这些教团。他为北京教团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吉德明逝世后,法国北京传教区就只剩下一名遣使会士南弥德和一位80多岁的原耶稣会士贺清泰了。这也标志着该传教区已开始衰败,甚至是趋于穷途末日了。

法国“钦点”的第3位入华的遣使会士是巴茂正(Charles Paris, 1738—1804)修士。他于1785年到达北京,充任清朝皇宫中的钟表匠。此人本来是一位机械师,又以“若瑟修士”(frère Joseph)之名而著称。他虽然未曾完成过高等学业,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具有全才的人物。他于1804年逝世于北京,其墓地也在正福寺。巴茂正在清朝皇宫中,取代了已故的入华耶稣会士汪达洪(J. M. Tournu Ventavon, 1733—1787),成为专职钟表匠和机械师。他曾制造过一座挂钟,长达3个月不用上钟摆的发条。清朝皇帝似乎对此感到兴致勃勃。时任遣使会总会长的凯拉(M. Cayla)于其1789年1月间的通报中,专门表扬了巴茂正这位“钟表匠修士”。巴氏在清朝宫廷共忠诚地服务17年(1787—1804)。由于他具有全才,故而除了作为钟表匠而为宫中制造多座钟表之外,还制造了两座报时钟、大小管风琴各一架。他还为清朝皇宫制造了一个有4—5尺高的机器人。当然,也有人怀疑这些机械制品是通过澳门而从欧洲进口,他可能仅仅是对进口产品略作巧妙修改而成的,他也可能是利用了能工巧匠荟萃的内务府造办处。巴茂正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写下了对大清皇帝的颂词。他为欧洲的汉学出版物提供了许多漂亮的汉文方块字的字模,这是欧洲当时为刊印汉学著作所非

常奇缺的物品。^①

巴茂正修正于1804年9月6日逝世于北京。于此之前他就精疲力竭了,每天蹒跚着前往皇宫中应差。他于7月中旬便交出了自己在皇宫中工作间的钥匙,深知自己再也无法入宫应差了,从此便长期卧床不起。法国传教区于此之后在皇帝身旁就没有自己利益的代表人了,只好又由年逾5旬的吉德明四处奔波,既负责宫中的事务。又负责布道事业。

在1784—1832年间,入华的葡萄牙遣使会士为21人,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权势上,均居西洋各国之首。但由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抵制,特别是由于各国传教士之间的无休争吵,教廷已决定撤销葡萄牙在远东的保教权。为此目的,教廷将在华的原有教区划分成了诸多宗座代牧区。同样的措施也适用于澳门,教廷仅仅为澳门保留了“主教府”的名称,但也只行用于葡占地。教廷将这项决定通知了葡萄牙籍的入华遣使会士主教马热罗(Jeronimo-José de Matta, 1804—1862, 1825年到达澳门),撤销了该主教对中国广东、广西两省的管辖权,同时又于这两个省设立独立的传教区,委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教廷的本意是作调停,却适得其反,激化了葡萄牙人的不妥协态度。马热罗主教最终于1850年发表了致其教区信徒们的主教训谕:《为抗议教廷传信部在交由葡萄牙女王陛下管辖下的传教区实施改革的问题而致全体信徒的主教训谕》。这种态度更激起了法国的反感,启发法国遣使会士作出了撤出澳门,将其司库部迁至中国另一个城市,特别是已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的决定。由此开始,逐渐完成了在华遣使会的主导权从葡萄牙人手中转向法国人手的过程。

^① 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75—79页。

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1784—17800),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仅有11人,分别于1784、1788、1791、1798和1800年莅华。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北京、湖广和澳门地区。1800—1829年之间,没有任何法国遣使会士被派往中国。1829年,陶若翰(Jean-Baptiste Torrette, 1801—1840)莅华,先后出任澳门遣使会会所的长上、委托给遣使会士们管辖的法国传教区巡视员。由此开创了遣使会士们入华的一个新高潮。

在1829—1850年间,法国入华遣使会士共有32人。他们分成1829、1832、1834、1835、1837、1839、1840、1841、1842、1844、1846、1848、1849和1850年数批入华。这些会士们分布在澳门、江西、浙江、蒙古、河南、江南、直隶和上海等地区。当时中国共有5个传教区被委托给了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主持:北京教区和蒙古、河南、浙江、江西宗座代牧区。河南省于1846年晋升为宗座代牧区,自1838年以来就合并的浙江—江西宗座代牧区于1846年又重新分开了。罗马于1839年又决定建立湖广传教区,法国遣使会士陈神父(R. Aubin, 1759—1795)、李神父(A. Pesné, 1767—1795)、马神父和特别是刘方济(F. Clet, 1748—1820)都曾在那里施行圣事,罗广祥也是于那里开始其布道生涯的。

有数位法国遣使会士出任北京和北直隶宗座代牧区的主教或宗座代牧,他们在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上和中西交流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曾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物中,最重要者首推孟振生主教。

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 1870—1868)于1834年到达澳门,于1835年7月2日到达蒙古西湾子,首先作为法国传教区的长上,后于1840年被任命为首位蒙古的宗座代牧,于1842年由金主教(Joachim Salvetti)在山西红沟子为他祝圣,于1846年被任命为北京

教区的主管并将其住院迁至安家庄,于1856年任北京和北直隶的宗座代牧。当撤销北京教区及其3个宗座代牧区时(1856),他们又暂时负责直隶的西南部。当英法联军于1860年侵华时,他掌握了刚被索回的北京教堂并将其住院搬到北堂。孟振生于1868年逝世于北京,其墓地在正福寺。

罗广祥当年就非常希望在中国的蒙古人中传播福音。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曾设法从某位蒙古王公处获准出让一片辽阔的土地,此项计划最终未能成功。但定居在距那里不远的喇咧沟的一个颇具影响的汉族家庭的家长却接受了法国传教区的洗礼。罗广祥又意图将蒙古的一批青年人送往北京,以培养蒙古民族的布道人。他仅获得了一名这样的蒙古青年,但在此人尚未被培养成才时,罗氏便去世了。吉德明和南弥德也曾很关心在蒙古的基督宗教教团,原则上是每年一次巡视那里。尽管当时的蒙古人口已达300万,在这片辽阔的领土上作巡视很困难。

1820年,嘉庆皇帝驱逐了法国北京传教区的会长南弥德。1827年,道光皇帝宣布将法国传教区的住院和教堂北堂收归国有。1829年,华人遣使会士司铎薛玛窦将法国小修院迁至了蒙古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并且在那里重建了小修院。所以,蒙古西湾子传教区是法国北京传教区的延续。

孟振生于正福寺休息3日之后,又于1835年7月12日也到达蒙古的西湾子,受到了当地基督徒们同情性的欢迎。薛玛窦立即辞职以将法国传教区长上一职交给了孟振生。孟振生对其前任和先驱们赞不绝口。在孟振生的主持下,法国传教区的基督徒已多达7000余人,其中长城之外者便有2000余人(葡萄牙传教区的信徒于同一时代却多达25000人)。

孟振生在西湾子接待了数名法国遣使会士,其中第一批是于

1835—1840年间到达的:

姓名	出生时间	入华时间	逝世时间
秦神父(Gabet)	1808	1835	1853
古伯察(Huc)	1813	1839	1860
孔主教(Daguin)	1815	1840	1859
羊铎(Carayon)	1814	1841	1848
盛神父(Faivre)	1803	1836	1864

其中第二批是:

姓名	出生时间	入华时间	逝世时间
龚伯察(Combelles)	1815	1841	1853
梁儒望(Gottlicher)	1822	1849	1867
戴济世(Tagliabue)	1827	1854	1890
白振铎(Bray)	1825	1858	1904
谢福音(Chevrier)	1821	1860	1870

这两批欧洲的遣使会士都为蒙古传教区做过大量工作。秦神父和古伯察从1844年起,完成了一项穿越蒙古、西藏和中国中原的旅行。羊铎于1843年被捕并被押至澳门。盛神父曾在澳门工作,后出任江南代理主教,又于1844—1845年返回蒙古。龚伯察自1848年起便在该传教区工作,白振铎与戴济世后升任主教,谢福音后于天津“殉教”。

孟振生于1841年4月15日被任命为蒙古的宗座代牧主教。^①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法国传教区的其他几位主教或宗座代牧。

董若翰(Jean-Baptiste Anouilh, 1819—1869)于1848年到达澳门,1849年到达北京教区,后被孟振生任命为北京的助理主教,

^① 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206—218页。

1851年在宁晋小营里祝圣。当北京教区划分成3个宗座代牧区时,孟振生任命他为负责直隶西部。他于1569年逝世于直隶正定府,被安葬在正定府著名的柏棠墓地。

苏发旺又称苏凤文(Edmond-Francois Guierry, 1825—1883),于1853年到达中国宁波,首先出任中国遣使会士传教区的司库,后于1864年被选为北京宗座代牧区孟振生代牧的助理,1870年在北京南堂由孟振生主教祝圣,于1868年接任孟振生而出任宗座代牧区,于1870年迁至浙江,1883年逝世于宁波。

田类斯(田嘉璧, Louis-Gabriel Delaplace, 1820—1884)于1846年到达澳门,后到河南作传教士,1852年当选为江西的宗座代牧,1852年在河南鹿邑县冯桥由安若望(Baldus, 1811—1869)主教祝圣,1854年迁至浙江,1870年迁至北京,1844年逝世于北京,其墓地在正福寺。

164
戴世济又叫达里布(Francois Tagliabue, 1822—1890),于1854年到达宁波,在蒙古作传教士。继孔主教(Daguin, 1815—1859)逝世后,他于1868年被任命为安若望主教的助理主教(江西),后于1869年迁至直隶西南的正定府,1870年在正定府由田嘉璧主教祝圣,于1884年迁至北京,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将北京北堂从蚕池口迁至西什库新址。他于1890年逝世于那里,其墓地在正福寺。

都士良(J. B. Hippolyte Sartou, 1840—1899)于1870年到达北京,先在北京宗座代牧区作传教士,于1885年当选为直隶西南部的宗座代牧,同年由戴世济主教在正定府祝圣,于1890年迁至北京,于1899年逝世于北京,其墓地在正福寺。

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1837—1905)于1862年到达北京,与清朝政府谈判了北堂的迁址问题并修葺了新的大教堂(1887—1888)。他于1897年被任命为都士良主教的助理,于1898

年由包儒略(Jules Bruguière, 1851—1906)主教祝圣,并于1899年继任该主教。他曾亲自经历了义和团于1900年6月13日—8月16日围攻北堂的全过程,于1905年逝世于北京,其遗体葬于他亲自建造的北堂大教堂中。

林懋德(Stanislas-Francois Jarlin, 1856—1933)于1886年到达北京,1889年由都士良主教晋铎,首先在保定府作传教士,于1897年任代理主教,1899年任省巡视员,于1909年出任樊国梁主教的助理主教并于1905年继任樊国梁主教而出任宗座代牧。他于其任期内曾为6位主教祝圣,为上百名华人原住民晋铎,使其传教区于1905年共有73920名基督徒。至其逝世的1933年,却使基督徒数目猛增至40万人,北京宗座代牧区也被细划分为保定府、天津府和宣化府3个宗座代牧区。他于1933年逝世于北京,被安葬在著名的钦赐栅栏墓地。

文贵宾(J. deVienne de Hautefeuille, 1877—?)于1901年到达北京,首先任北京大修院院长,然后又在北直隶作传教士,其后于栅栏初修院作神师,1915年被任命为顾其卫(Jules-Auguste Coqset, 1847—1917)主教的助理,同年由林懋德于正定府祝圣,于1919年被任命为林懋德主教的助理,于1920年被任命为“滨海直隶”(天津)的宗座代牧区的总管,1923年又任该宗座代牧区的宗座代牧。

富成功(Joseph Fabrègues, 1872—1928)于1896年到达上海,后被调至北直隶作传教士,于1905年主持保定府的教务,后出任新设立的中直隶宗座代牧区的宗座代牧,于1910年在保定府由林懋德主教祝圣,于1923年被任命为林懋德主教的助理并于此后继任此人。他于1928年于赴罗马途中,死于西伯利亚鄂木斯克(Omsk)附近的铁路上。

满德贻(Paul Montaigne, 1885—?)于1907年到达上海,同年到

达北京后便出任北京大修院教授,然后在保定府作传教士,于1924年任保定府的宗座代牧,于1925年由刚恒毅(Costantini)主教祝圣,1925年曾出任过教皇大使,于1930年任北京宗座代牧区林懋德主教的代理,并于1933年继任了林懋德^①。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法国遣使会士中,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南弥德神父(Louis-Francois Marie Lamiot, 1767—1831)。南弥德于1791年到达澳门,在教廷传信部司库部秘密晋铎,于1794年进入北京,在清朝宫廷中任翻译,于1812年任法国传教区长上。由于他与因教案而死的刘方济关系密切,故于1819年被迫离开北京赴澳门,并在澳门建了一座遣使会修院。他最终在1831年逝世于澳门并被安葬在圣若瑟堂。^②

南弥德逝世后,陶若望曾介绍经过南弥德的学术成就:其汉语知识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澳门学习过的人的爱戴和尊重。在汉语翻译方面,他超过了在澳门和广州工作的所有人。^③他主要是翻译了传教士们发自朝鲜的3封信件。这3封信件是由朝鲜的3名新教徒写于其衣服的丝绸里子上的。其中有的是叙述朝鲜教案的,有的是致教皇和北京主教的书信。南弥德将它们译作法文。他还精通满文,这是在清朝宫廷中做翻译所必不可少的知识。他也可能编写过一部汉法词典。因为入华传教士们都具有编写汉文

①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安多,《北京传教史》。

②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第12-13页。

③ 《遣使会回忆录》第2卷,第624页。

词典的习惯。^①

以上就是法国人华遣使会士中几位宗座代牧在华活动的情况。他们代表着基督宗教入华史的重要一环，而且是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和一种新的传教策略。

三、入华遣使会士与中国 基督宗教的“本土化”

入华遣使会士们非常注重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各地的原住民中培养神职人员，而且是高级神职人员（司铎）。这在天主教的其他修会中是颇为罕见的。他们在基督宗教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起过重要，是基督宗教入华的一个重要阶段。

据原法国人华耶稣会士荣振华在《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②中统计，1552—1800年间，在华耶稣会士共有975人，其中的华人（包括澳门华人）修士只有36人，司铎或神父9人。甚至像杨廷筠那样的文豪，也只不过是修士而已。据1892年刊印的

167

① 据笔者所知，天主教传教士们编写的词典大致有：

1. 曾德昭 (de Semedo), 《汉 - 葡词典》。
2. 曾德昭 (de Semedo), 《葡 - 汉词典》。
3. 恩理格 (Herdtricht), 《汉 - 拉词典》。
4. 马若瑟 (de Prémare), 《汉 - 拉词汇》。(编到字母 D)
5. 巴多宁 (Parrenin), 《拉 - 汉词典》。
6. 汤执中 (d' Incaville), 《法 - 汉词典》。
7. 孙璋 (de La Charme), 《拉 - 汉词典》。
8. 孙璋, 《汉 - 蒙 - 法词典》。
9. 孙璋, 《法 - 汉 - 满 - 蒙词典》。
10. 钱德明, 《鞑靼语 - 满语 - 法语词典》。

② Joseph Dehergne S. J.,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 1800, Paris et Rome, 1973.

1552—1870年入华耶稣会《修士与神父名录》统计^①，在近320年的漫长岁月中，由耶稣会士们培养的全部华人司铎也只有区区45人。

据前引方立中的《1697—1935年入华遣使会士列传》统计，在1697—1935年的在华964名遣使会司铎中，华人却多达355人，远远超过了1/3。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均居该宗教修会教阶中的最高神品的司铎，其中包括汉人、蒙古人、澳门和香港公民在内。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但他们在促使天主教在中国大众中发展过程中，曾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从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倡导的“上层”或“知识层”路线转向了贫民百姓。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入华遣使会士们已经改变了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的布道策略。已经高度注重培养华人司铎，从而向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方向迈进。

入华遣使会士秦噶哗(Joseph Gabet, 1808—1853)于1835年经澳门入华，曾随古伯察(Evariste-Régis Huc, 1813—1860)赴蒙古和西藏旅行。他于《1846年的在华天主教传教区》的致教廷的年度报告^②中，便强调了培养中国原住民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重要意义。

他首先指出，如若无原住民神职人员，那就几乎剥夺了天主教在中国举行公开崇拜仪式的权力。外国传教士无法作更多的弥撒和巡视所有的天主教堂口。欧洲司铎们永远都无法熟练地运用中国语言，在归化新教徒方面始终力不从心。如果司铎都是外国人，

① Catalogus Patrum et Fratrum, 1892年刊印。

② R. P. Gabet, 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 en 1846, pp-37 - 45, Paris Valmonde, 1999.

那么天主教在中国永远会显得是一种外来宗教，永远会被人视同清帝国中白莲和无为一类的一种秘密会社或邪教。所以，天主教在中国必须“民族化”或“本土化”。但也有人提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处于“异教”的统治之下，但他们也习惯于从事慈善事业。中国人虽然执著于自己的风俗习惯，但主要是在世俗方面，与宗教无关。因此，对中国人司铎的任何指责，都不是结论性的，更不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些问题上，欧洲司铎们必须放弃其成见与陈习旧俗，这是在中国赢得人心的唯一有效方法。

入华遣使会士们培养中国原住民神职人员的主要手段，便是建立学校、备修院和大小修院，或者是在教堂中与中国神职人一并工作。

在罗广祥于1801年11月16日逝世于北京时，北堂修院中便有一名华人五品修士（副主祭）和一名华人低级神职人员，均为遣使会士。那里同时还有两名神学学生和5名拉丁文学学生，其中有3人仅于4—5年之前领洗。此外还有法国遣使会士南弥德司铎和巴茂正修士，再加上一名华人助理教士王保禄（Paul Ouang, 1751—1827）。由此可见，当时华人神职人员的势力已经很大了。^①

当遣使会士们到达北京时，法国传教区中没有任何教育与医疗结构，更没有修院、学院和孤儿院。遣使会士在北京和北京之外的基督宗教教团中建立了男青年学校。仅北京的学校就包括百余名青年，其中尚未将正在准备具有神职人员身分的40余人计算在内。罗广祥当时所关注的，便是立即建立一支原住民神职人员队伍，首先是在法国波旁岛建立遣使会的一座初修院，以在法国培养华人司铎，因为他发现在华的欧洲司铎们过分排斥中国原住民神

^① 安多，《北京传教史》下卷，第67页。

职人员了。但遣使会总会长凯拉却根据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们的建议,认为应由罗广祥亲自在北京培养青年神职人员,这样经济负担也小一些。罗广祥因此而首创北京备修院,委托吉德明司铎管理。该初修院培养了不少华人神职人员。罗广祥本来也想创建一所女子圣爱会(贞女会)一类的机构。以培养女性中的慕道友。他甚至还培养了数位贞女,并派遣她们赴各省布道。但他的突然死亡却使这项事业中止。^①

正如前文所述,吉德明在他于华布道的28年中,培养了20名杰出的中国原住民司铎。他为此而经常巡视北京及其住院周围20—30里范围内的基督团体。由于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原住民信徒在困难时期,是传信事业的唯一支柱,故为此而坚持不懈地努力。^②

在法国遣使会士们培养的华人司铎中,最著名者就是薛玛窦(Mattnieu Sué, 1780—1860)。薛神父于1780年出生于山西省,1809年在北京晋铎。1819年,当南弥德被驱逐出北京时,便委任他担任法国北堂传教区的长上。当清朝政府于1827年关闭北堂时,他便率领其全部神职人员撤退到了南堂。他在那里仍然感到不安全,便于1829年撤退到了蒙古宣化府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直至此时,其长上的职务才由孟振生取代。他于1848年奉命负责宣化府会口,并任该职务长达10年之久。薛氏于1860年逝世于宣化府的孟家坟,被安葬在宣化府。^③ 经过薛玛窦等人的工作,共有150户人家的西湾子,绝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基督宗教的归化,只有30余人拒绝入教。他们得以聚敛大量钱财,以建造一座教堂,

① 安多,《北京传教史》下卷,第30页。

②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

③ 《入华遣使会士列传》,第21页。

该教堂被奉为中国除了北京之外最漂亮的教堂。他们两次在西湾子开办为期3个月的冬校,培训原住民教经先生(传道员),许多人前往那里学习基督宗教的教义。^①

笔者于下面将简单地介绍几位由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们培养出来的华人原住民遣使会士司铎,特别是早期出生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或者是由北京修院晋铎的华人司铎。^②

法国北京传教区培育出来的第一位华人遣使会士是李神父(Jeseph Li, 1754—1827),原为江南的一位回教徒,为经商而赴北京。他在北京受到过法国传教区的施教并接受洗礼。由于当时法国传教士缺乏教师和教科书,他只好从用汉语写成的宗教教理书中学习基督宗教知识。李氏于1790年在吉德明面前发愿,于1792年晋铎。随后被派往湖广传教区,后又前往江西并于1827年逝世于那里。

张神父(Jean Tchang, 1769—1833)是北京人。他于1791年在北京法国遣使会传教区发愿,1796年晋铎,1798年被派往湖广,后又转向江南(江西)。他在那里归化了某些富裕的基督徒,从他们手中获得金钱后又前往无锡的贫穷基督徒中布道。他甚至还深入到由葡萄牙遣使会士们管辖的南京传教区的富裕教徒中布道,1833年逝世于无锡。

程神父(Etienne Tcheng)诞生于异教徒的家庭,后于北京领洗。他为了学习神学而远赴澳门圣若瑟学院深造。他后来被派遣到北京传教区,却由滞留于澳门的韩纳庆负责其初修学业。他于1791年在澳门发愿,最后却是退出了修会,于1826年左右逝世。

① 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4章,第198—221页。

② 方立中,《入华遣使会士列传》中各位华人司铎的列传;于纯璧,《北京传教区与遣使会士》第4章,第163—166页。

张神父(Jouventin Tchang, 1770—1830)于 1795 年在吉德明面前发愿, 1799 年晋铎, 于 1800 年被派往湖广省做传教士, 经过 3 年的行使圣命之后, 于 1803 年逝世, 由刘方济神父亲自为他举行临终圣事。

韩神父(Joseph Han, 1772—1844), 可能是诞生于北京以南的固安县韩家庄, 1796 年在北京发愿, 曾虔诚地在北京传教区工作, 后于河南工作数年并于 1835 年返回北京。他是吉德明的弟子, 并被吉德明任命为其修院的副院长。他于 1844 年逝世于宣化府, 年长 71 岁, 致力于布道事业长达 47 年, 其墓地位于宣化城东。

邓神父(Teng Paul, 1771—1803)于 1795 年被接受进北京修院, 1797 年在吉德明面前发愿。他充满才能与虔诚, 1801 年晋铎。由于他精通拉丁文, 所以传教区本来希望让他在修院教授拉丁文, 但他因患慢性病而于 1803 年早逝。

申神父(Chen Cyrus, 1769—1827)是山西潞安府人, 1795 年被接收进北京修院, 1797 年发愿, 1800 年晋铎, 于 1803 年在蒙古布道数月, 1804 年之后, 被派往江西, 1827 年逝世于江西临江府。

宋保禄(Soung Paul, 1774—1854)诞生于河南开封府, 1799 年进入北京修院, 1801 年在吉德明面前发愿, 1803 年晋铎, 多年与刘方济神父一道工作, 并虔诚地保存了刘神父的 37 封书信。他曾长期地在湖广和河南布道, 甚至还到开封监狱中布道。他于 1854 年逝世于河南驻马店附近的韩庄, 享年 80 岁, 共布道 55 年。

王神父(Wang Joseph, 1777—1814)诞生于北京, 1801 年进入北京修院, 1803 年在那里于吉德明面前发愿。他熟练地掌握了拉丁语, 还与巴茂正修士一起从事钟表匠工作。在巴茂正逝世后, 遣使会曾希望由他来继承其皇宫中的事业。但他作为一名华人司铎, 不能长期不参与巡视教团的工作。王神父由于疲劳, 于 1814 年早

逝。

何神父(Ignace Ho, 1781—1844)出生于北京, 1804年被接收进修院, 1806年在那里发愿, 1808年晋铎。他首先在湖北做传教士, 于1819年被派往蒙古, 1820年又赴澳门休养, 后返回河南, 改姓童。在刘方济被捕期间, 他曾一度代理负责法国传教区在湖北的教务。但他仍于1829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新疆和田, 1844年客死于那里。

沈神父(François Chen, 1780—1825)于1805年被接收进北京修院, 1807年发愿, 1808年晋铎。他随后赴湖广作传教士。刘方济被捕后, 他也曾代理教务。他于1819年2月被捕, 与刘方济同关一牢, 于1820年被发配伊犁。1825年, 当沈方济已获准返回内地时, 却被由张格尔的叛军杀死。

郑神父(Antoine Tcheng, 1778—1835)于1805年进入北京修院, 于1807年在那里发愿, 同年晋铎, 然后被派往湖广省。他又经那里转往江西省, 于1835年逝世于江西瑞州三桥。

岳神父(Jean Yao, 1785—1811)出生在北京西山, 1808年进入北京修院, 1810年在南弥德面前发愿, 1811年晋铎。他行使圣命两年之后, 便于1813年在正福寺逝世。

林神父(Vincento Lin, 1779—1836)出生于福建省, 1809年进入遣使会北京修院, 1811年发愿, 1815年晋铎。他赴蒙古作传教士, 1837年逝世于蒙古的西湾子, 年长57岁, 布道时间长达27年。

高神父(Thomas Kao, 1872—1832)出生于蒙古, 1810年进入遣使会北京修院, 1812年在那里于南弥德面前发愿, 同年在那里晋铎, 于北京教区一直工作到1832年。他于1832年到达蒙古西湾子不久, 便逝世于那里, 其墓地正位于那里。

艾神父(Stanislas Ngai, 1875—1849)出生于湖北郟阳府的上津

堡,1810年进入北京修院,1812年在南弥德面前发愿,1817年晋铎。他先后到湖北、河南和江南等省布道。自刘方济于1820年在湖北“殉教”之后,任何欧洲传教士都不便于前往湖广传教了,只有华人司铎在那里维持工作,直至罗广祥于1833年到达那里为止,艾神父在那里接待了他。湖广省于1839年被委托给了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艾神父于是便前往河南省,并于1849年逝世于河南光州万家河,被安葬在驻马店的韩庄附近。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入华遣使会士们在近250年间,于基督宗教的教务工作中作了许多事,是中国传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部分地继承了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传统,在中国的天文、地理、音乐、绘画、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和哲学领域也成果甚丰,在海外汉学发达史、中学西渐史和西学中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不容忽略。

1. 法国遣使会中国传教区,不同于天主教其他修会和传教会的中国传教区。诸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他们在华活动只代表本修会或传教会本身。法国的遣使会中国传教区,是由法国路易十六国王法钦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法国政府与教会在华的“官方代表”,继承了法国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是入华不同教派中国传教区中的“国家队”。

2. 法国遣使会中国传教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耶稣会士们的在华传教策略。耶稣会士们是希望通过归化中国的上层(总督、巡抚、士大夫、名儒、皇亲国戚)和甚至是皇帝本人,来使中国全面接受天主教。他们梦想将中国变成第二个君士坦丁堡,使中国皇

帝成为第二个康斯坦丁大帝。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们则更侧重于贫穷和边远地区,着眼于华人中的下层贫民,并且大力从平民中培养高级神职人员。

3. 入华耶稣会士中的不少人,在莅华之前,就是颇有名气的各个学科的专家。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他们只能试图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基督宗教。入华遣使会士们大都是纯粹的宗教人士,文化水平偏低,草根出身,人文科学修养不深。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在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中国的活动余地。由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太好,故 50 岁之前去世的人占有很大比例。

4. 法国入华遣使会士们也如同入华耶稣会士们一样,他们在北京西什库印刷厂和香港拿撒肋印刷厂,印制了大批宗教和人文科学的书籍,堪与入华耶稣会士们的献县和徐家汇印刷厂相媲美。所以遣使会士们虽然比耶稣会士们逊色不少,却依然注重“书籍传教”的策略。

5. 入华耶稣会士们只办外语学校(四夷馆)和培养外交人员的学校,也创办医院,但入华遣使会士们除了举办大小修院、备修院、孤儿院之外,还特别注重创办小学、医院和康复医院。他们也注重于文化传教的社会功能。

6. 入华遣使会士们非常注重培养华人神职人员,特别是高级神职人员,从而实现了基督宗教在华传教史上的一次大转变,产生了从由西方人强行传入发展到由中国人自愿接受并接力相传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宗教在全世界传播的整本潮流与趋向。

7. 遣使会在华传教的后期,可能受了基督新教在华传播策略的影响,具有某种改革倾向,也可能是片面地吸取了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礼仪之争”失败的教训。又正是由此,他们过分地介入了中

国“礼仪之争”，竭力地抨击中国礼仪，从而在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努力工作的时间，也制造了许多障碍，进而在客观上影响了中西关系的发展。

8. 入华耶稣会士们当时既没有以西方坚船利炮为后盾，也没有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为靠山，而是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和理念来吸引中国人。入华遣使会士们于后期的行为却大相径庭了。他们认为“诱惑”工作已经完成，开始毫无掩饰地直接传教了。他们也确实配合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和武装侵略。也有过许多鱼肉乡民的行为，因而导致了“教案”频发。